



【广深今谈】

广州固然需要金融产业,但更需要文化创意产业与传媒产业的大发展,这是广州的优势所在。

广州的金融春梦该醒醒了

今论

最近一段时间,广州红专厂创意园要拆的消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其微博上表示:“据说它是沿用建于1956年的广州罐头厂,将废弃生产车间改造成既时尚又能给予无限灵感的创意空间。3年的打造,成为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创意产业区。最近因为要全部规划成为金融中心,政府准备夷为平地……”

对于这样的新闻,各方表态各异:有人认为需要“保卫文化”,有人认为红专厂不过是一个食街(内有不少餐厅、咖啡厅),不必诉诸于“文化悲情”,也有人认为“政府为了城市发展做出拆迁决定无可厚非”……

笔者不希望再从上述角度切入讨论,拾人牙慧,而更愿意从城市产业定位和差异化竞争的角度谈谈广州在发展思路上可能已经出现的失误。红专厂创意园拆迁的动议反映的不仅仅是所谓文化与资本的博弈,同时还凸显广州在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方面出现了严重误判。

广州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自然是有一番宏伟蓝图,加上后续优惠、奖励政策,相信也会吸引一些金融企业入驻。但是,这真的是广州必须做的事情吗?这真的已经充分发挥了广州的优势吗?广州已经有了珠江新城,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写字楼空置率不低。广州此时再推国际金融中心项目,目的无非两个:其一,炒高地皮价格,把手中土地资源卖个好价钱,在捞土地财政这

些钱的同时,拉动区域房地产价格的销售,让政府再多收些税金。其二,就是政绩的需要。

广州作为华南地区的千年古城,而且是行政、文化中心,就华南地区而言,天然地具有文化创意产业、传媒产业优势:大学林立,研究机构众多,传媒发达,岭南画派独树一帜,公民社会雏形初现,各种论坛活动人气旺盛,与深港交通来往也颇为便捷。

但是,广州市政府并未真正为文化产业的崛起与发展做多少有益的工作,而是沉溺于“投一些钱、做一个项目,然后自我表彰”的落后模式。广州这些年出走了不少知名文化人和资深传媒人:广东美术馆原馆长王璜两个,其一,炒高地皮价格,把手中土地资源卖个好价钱,在捞土地财政这

样是在2009年,时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任剑涛离开广州北上。广州的传媒发达,造就了不少传媒领袖和业界精英,但是因为发展空间小,他们大多选择北上。2009年,网易将其内容中心从广州迁往北京;2012年,网易游戏频道从北京迁往杭州办公,而不是网易游戏事业部所在的广州——对此,广东省人大代表、网易CEO丁磊表示,网易在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都有分公司,但在广州得到的政府扶持力度最小,公司在广州发展缓慢。遗憾的是,广州市政府对此似乎浑然不觉。

这些优秀资源和资源的流失,潜移默化地对城市的文化气质有负面影响,如果持续加剧,对于城市高端文化的消费力也是一个沉重打击。

深圳与香港毗邻携手,金融是其强项,广州已难望其项背,何况深圳也早有“基金之都”的称号,如今又有前海打前锋,广州即便建起了国际金融中心,恐怕也追赶乏力。至于北京上海,挟各种政治、地域、政策优势,其金融地位难以撼动。

广州是时候从金融春梦中醒来了!广州固然需要金融产业,但更需要文化创意产业、传媒产业的大发展,这是广州的优势所在,切莫以己之短比人之长。广州应该从现在起,在税收、土地、户籍、资金等诸多方面对文化创意产业、传媒产业予以大力支持。广州已被定位为国际中心城市,但是广州的决策者视野不够广阔,正如任剑涛所说“太小气”,这样的“小气”与短视可能会毁了一个原本朝气蓬勃、生态多样的历史文化名城。

【世说微语】

@许小年:上世纪80年代是改革的年代,领导全球改革浪潮的是撒切尔夫人、里根、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他们与庸碌官僚和势利政客的区别是信仰,相信自己为国家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无论后人怎样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他们将作为政治家而载入史册。

@左晓蕾:有人说日常消费的感受相差很大,怀疑3月CPI增长2.1%数据的真实性。这里感觉的误区属于数字幻觉。2.1%的增长说明物价还是在上涨,不是物价下跌,只是上涨的幅度低于上个月的涨幅而已。所以当然有上涨的感受。现在对数据的解读和理解有很多误区,增幅下降不是物价下降。物价并未下降。

@杨红旭:三股力量,决定着我国2013年的经济生活。通胀起,则货币紧,抑制经济与楼市。3月CPI回落至2.1%,为保增长提供了短暂的、宝贵的货币空间,但好景难长。房价高涨,则调控急;房价回落,则住宅销售与开发投资皆收缩,从而拖经济后腿,故政府不敢狂压楼市。够纠结!

@胡锡进:河北沧县“红豆局长”邓连军迅速被免职,再次发出了这个时代的明确信号。干部以民为本应当是真心的,有基本业务素质是起码的,认真履行职责应当是实实在在的。新时期下,官要有畏民之心,不可有治民、更不可有欺民之念。否则,就等着舆论“抓现行”的概率撞上他的那一天吧。

@韩志国:国五条的要害不是强化房价调控,因为在供求失衡条件下,限制二手房交易无异扬汤止沸。国五条很可能是政府一个更大的局的一部分:20%资本利得税过高导致卖家惜售,那么在明年固定资产登记系统建成后,立即推出房产税,不管房子卖与不卖,政府都是最大赢家。

@马靖昊说会计:IPO项目好比去西天取经,西天肯定就是那个证监会了,取的就是那一纸批文;客户是唐僧,谁都想去咬一口;那匹马来是保荐人,虽然没见骑几回,但得跟着;券商是悟空,通天的,什么事都得靠他去摆平;审计是沙和尚,干的虽是苦活累活,但保驾护航有功;那位八戒或是律师,靠嘴巴吃软饭,通常还有点小好色!

@薛蛮子:微信收费一事,不由让人想起一个老段子:波茨坦会议期间,丘吉尔到卫生间小便,见斯大林也走了进来,立即拉上裤裆拉链,躲到角落,警觉盯着斯大林。斯大林疑惑不解,问丘吉尔。丘吉尔答曰:你们只要看个稍微大一点的东西都要收归国有!

(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辑录)



【吐曹青年】

“大数据”能力不仅是一种统计技术和数据分析能力,更考验着政府在信息上的开放和透明。

禽流感考验政府大数据能力

曹林

在令人恐惧的SARS事件过去10年后,令人不安的禽流感又来了。最新报道:4月9日上海新增确诊2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浙江新增2例;全国共发现确诊病例28例,共8人死亡。一个好消息是,上海4岁感染H7N9禽流感男童康复;一个坏消息是,农业部称不排除更大范围检出H7N9禽流感。人们很习惯遗忘,政府尤其健忘,可实现逼着政府去反思SARS事件10年后自己在提升信息公开和改善突发事件应对上到底做了什么?

流感信息的发现、统计和发布,关键是数据的处理。这一次的禽流感,尤其考验着政府的“大数据”能力。

“大数据”是近来很流行的一个概念,是面对信息爆炸时代产生的海量

数据,对这种庞大的数据资源的处理能力和统计技术。谁率先具备从各种各样类型的数据中快速获取有价值信息的能力,谁就是赢家。很有意思,关于大数据最闻名的故事,就与流感相关。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开篇中就讲了这个故事:2009年甲型H1N1这种结合了导致禽流感和猪流感的病毒出现时,全球的公共卫生机构都担心一场致命的流行病即将来临,可各国疾病和预防中心在发现和统计流感信息方面又很滞后,因为人们在以为自己患了普通流感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去医院,病重时才去,医院才会搜集到这个信息,而且这种信息传到疾控中心也需时间,所以通告新流感病例时往往会有一两周的延迟。对于一种可能飞速传播的疾病,信息滞后两周的后果将是致命的。

而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的工程师

发表的论文则让公共卫生官员们感到震惊,文章解释了这家公司为什么能够预测到冬季流感的传播:不仅是全美范围的传播,而且可以具体到特定的地区和州。这家公司是通过观察人们在网上的搜索记录来完成这个预测的。他们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球超过30亿条的搜索指令,他们希望通过分析人们的搜索记录来判断这些人是否患上了流感。他们不是简单地以“哪些是治疗咳嗽和发热的药物”之类检索词条来判断,而是通过检索词条的组合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所以,这一年甲型H1N1流感爆发的时候,与习惯性的官方数据相比,这家公司建立了一个更有效、更及时的指示标。

舍恩伯格是想通过这个故事说明,大数据深刻地改变了公共卫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当天H7N9禽流感成为问题时,我们的政府部门

有必要反省自身的“大数据能力”:政府有没有告别那种滞后的统计方式,有没有能力对海量数据进行有效的分析,从而让政府的判断走在疾病传播的前面,不仅能预测,更能在流感传播前进行有效的预防。

“大数据”能力不仅是一种统计技术和数据分析能力,更考验着政府在信息上的开放和透明。首先,政府能不能获得真数据?现在很多政府部门最缺乏的就是获得真数据的能力,层层虚报,层层造假,“知情权”被层层说谎的体制所剥夺,没有能力获得反映真实情况的数据信息,海量数据都是垃圾数据。然后,信息能不能自由流动?在一个信息被垄断和被操纵的空间中,信息是很不完整的,碎片化零散的信息自然难以进行大数据分析。最后,信息能不能透明公开?以“担心影响社会稳定”、“公开会引起恐慌”的理由封锁信息,那是最愚蠢的。

有一种批评叫没弄清事实

贾杜

汉代史学家班固称赞自己的同行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这12个字应该是叙述者或者评论者的最高境界。是人就会有善恶,说话必然带褒贬,评论者就某事发表观点,或弹或赞需要态度鲜明。

不过,在时事评论当中,很少能找到热情的赞美,到处都是犀利的抨击。有几个原因可以用来解释,一种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使然,据说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词义包含着不同意者的意思。公共知识分子谈论公共事务,批评比赞扬重要,他们总是喜欢高呼:我不相信!

另一种解释是对强者只用批评,不需赞扬。时事评论的对象多是当局者,他们是一群需要在公众监督下才

能做好事情的人,事情办好了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搞砸了则要接受问责。实际情况是,他们经常把事情搞砸,所以舆论对他们就不能客气。

产品要想畅销,最好琢磨消费者的需求,还有一种解释可能评论者不太愿意承认,评论需要吸引读者,会自觉不自觉地迎合大多数人的观点,喜欢听啥就说啥。比如很多人对政府有意见,批评官员往往受到欢迎;人痛骂丑恶的社会现象,慨叹人心不古总不会有错。简单地说,这些观点是大多数人都赞同的。前两种解释是行业规律,无可厚非,第三种解释则需要警惕,大多数人的观点不一定都正确。

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称,国家发改委不久将会上调天然气价格,而且涨幅惊人,被涨价吓怕了的老百姓纷

纷未雨绸缪,怀揣速效救心丸连夜排队买气,地方政府再三辟谣也不起作用,最后国家发改委官员出面澄清涨价传闻,抢气潮才逐渐平息,没曾想过还不到一个星期,长春市便宣布上调天然气售价,提前购气的需要补足差价。把国家发改委的澄清和长春市的调价通知截图放在一起,可以有力地证明大多数人的观点:政府总是出尔反尔,升斗小民要好自为之。

政府的确有出尔反尔的前科,即使没有前科时常敲打也没啥不对,但是以未经仔细推敲的证据来迎合众人观点,是不够理性客观的做法。实际情况是,天然气价格出厂价和零售价,发改委管理出厂价,各地政府及燃气公司负责零售价,长春和苏州等地早已履行听证程序,涨的是零售价,天然气出厂价或管道价确实暂

无涨价计划。老百姓分不清天然气价格的差别,拥有较强分析能力和辨别能力的媒体人有必要传递准确的信息,其中不应该夹杂太强的个人好恶和情绪,更不能一味地迎合公众对涨价的反感和对政府的不信任,尽管这很过瘾。

还有一例,近日有新闻称“长春老人突发脑梗塞摔倒,178人漠视仅1人守护”,有媒体就此评论:道德败坏,人情冷漠,我们的社会简直没救了。但据后来媒体补充的消息,当时很多人欲施以援手,但被有医学知识的人阻止,“漠视”是符合医学规范的做法。有些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其实是先入为主,很多读者的头白撞了一次。无论是惩恶还是扬善,都需要以准确的事实为依据,所谓“其事核”即是指此,把没有逻辑关系的证据和结论硬放在一起,会严重削弱结论的可信度。

测不准的猪

余胜良

在预测价格方面,人类不比一头猪在股市面前表现得更好。养猪户大面积亏损,各路神仙说得头头是道,各有道理却全无理由。通往结果的道路千条,即使已知结果如何,我们还几乎无法还原路径,更不用说靠现象推测结果了。

记者们写菜价下跌农户自杀,写养猪户杀猪,养牛户杀牛,都是跟在结果后面跑。新记者还有热情,老记者却感到无奈,这些新闻已让人疲惫。当被问及原因时,业内人士也是一脸苦笑,原因无非几条:天气、疫情、突发事件、供应量、需求量。

聪明人于是说,为何不找到一种方法,让养殖户趋利避害呢?比如为他们提供生猪存栏量作为参考。

即使有存栏量,也很难预测猪价,决定当前猪价的是近期要推送到市场上的毛猪,这就来分析猪的年龄结构,准确统计猪龄几乎无法办到,统计哪些猪要被留下来作为母猪,也很难。

饲料价格,养殖规模,空中飞过的那只鸟身上是否带着H7N9,都让猪价发抖。到头来发现无论哪个变量都有多动症。

决定猪肉价格还有令人困惑的因素,例如肉价大幅上升大幅影响物价指数时,政府会撒大把银子养更多母猪,这样在猪肉价格下跌时,养母猪可

能是赚钱的,养肉猪却赔钱——这种干扰因素很难预测和控制。

大宗农产品需求稳定而且易于保存,价格一般比较稳定,但是每年还会有波动,遇到自然灾害波动还会很剧烈。今年不少黑龙江农民家里还存着玉米没卖,价格大跌而且没有买方,而去年美国玉米减产,还曾让市场认为玉米价格将大幅上涨。与大宗农产品相比,蔬菜不易保存价格波动就更为剧烈。

不仅仅是农牧产品,在所有竞争领域,产品价格都很活跃。铁矿石价格一直上蹿下跳,黄金被认为是其他产品的估值中枢,和美元的比值也变个不停。

实际上,在几乎所有竞争性行业中,价格都不应该被提前预测到。

假设可以预测到准确数字,那么我们将可主动规避风险。预测准确价格,意味着可以推演出需求和供给,以及利润如何。那么知晓利润很好的情况下,自然有人会加大供应量,而利润差的情况下,会有人减少供应——这是种动态博弈,让预测价格的模型基本不靠谱。

一辈子和价格打交道的人经常会自我安慰:正是因为预测不准,才有乐趣。我也发现那些说话谨慎的人往往是业内翘楚。因为他们发现更多可能性,勤于搜集更多资料。

他们一辈子都在无秩序中寻找秩序。



【念念有余】

饲料价格,养殖规模,空中飞过的那只鸟身上是否带着H7N9,都让猪价发抖。